

统编语文教材 新增课文为什么是这篇？

■受访人:赵红仕(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董事长) □采访人:孟丽媛(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)

2025年秋季开学,统编八年级语文教材迎来了一篇令人瞩目的新增课文——《天上有颗“南仁东星”》。这篇课文由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根据自己的作品《中国天眼:南仁东传》(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)相关章节改写。因其完美契合新时代教育核心诉求:以文学之笔,刻画出“中国天眼”之父南仁东舍弃海外优渥条件、扎根深山廿余载的动人形象,将科学家“仰望星空”的理想与“脚踏实地”的担当具象化。课文不仅填补了教材中当代顶尖科学家范例的空白,其蕴含的坚韧信念、家国情怀与科学使命,更成为青少年价值观塑造的鲜活教材,在“科教兴国”战略引领下,为下一代点燃精神火种,照亮科学报国的征途。中国出版传媒商报采访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董事长赵红仕,他坦率地说,“这次入选虽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,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”。



赵红仕

□当得知《天上有颗“南仁东星”》入选八年级语文教材时,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?

■收到消息的那一刻,我们的心情是既激动又感恩。激动的是,这本历时多年打磨的作品能够走进课堂,与千万青少年的青春岁月同在;感恩的是,这背后不仅是王宏甲老师的匠心创作,还有编辑团队、科学界的共同付出。对我们来说,这不仅是一本书的荣誉,更是一次文化传播的跃升——从书架走向课本,从读者的手中走进青少年的心里。作为出版方,我们一直希望通过图书让科学家精神被更多人了解,而教材的覆盖面和权威性,让这种精神的传递变得更深远、更持久。这一刻,我们感受到出版人的价值,也感受到南仁东精神与时代的共鸣正在被下一代接力。

□此次入选是否在预期之中?你认为教材编审专家最看重该作品的哪些特质?

■坦率地说,这次入选虽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,但并非完全出乎意料。我们在策划之初,就深知南仁东的故事兼具科学价值、精神力量和文学感染力,是非常适合进入课堂的优质文本。从教材编审专家的角度看,我认为他们看重的有几点:一是人物典型性——南仁东作为“中国天眼”的首席科学家,代表了新时代科学家的品格与担当;二是精神感召力——他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在偏远山区,放弃国外优越条件,坚守科研梦想,这种信念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塑造极具积极力量;三是文学表现力——王宏甲老师的笔触细腻、生动,既有科学细节,又有情感共鸣,能够引导学生在阅读中获得思考与感动。这些特质与教材选文的教育目标高度契合。

□在“科教兴国”战略背景下,你认为这篇课文对青少年科学价值观的培养有何独特作用?

■“科教兴国”不仅是国家战略,更是一代代人的使命传承。在青少年阶段,价值观的塑造至关重要。《天上有颗“南仁东星”》的独特之处在于,它不是抽象的科学理论,而是通过一个鲜活的科学家形象,让孩子们感受到科学的温度与重量。南仁东的选择——舍弃国外优渥条件,回到祖国最偏远的山区建设世界一流的电望远镜——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榜样:科学不仅是探索未知,更是责任与担当。这样的故事能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科学观:科学精神不仅是好奇与求知,还包括坚韧不拔、团队协作、为国家和人类发展服务的使命感。在今天信息快速更迭的环境中,这种精神引导尤为珍贵。

□与传统的科学家题材作品相比,南仁东的故事在当下有何不可替代性?

■南仁东的故事具有鲜明的“当代性”与“世界性”。传统科学家题材往往发生在较早的历史时期,虽然同样令人敬佩,但距离当代青少年的现实生活较远。而南仁东的奋斗历程与“中国天眼”的建成,恰好发生在他们成长的时代,新闻报道、纪录片甚至网络热搜中都出现过他的名字,这种时空上的贴近感让故事更容易被感同身受。此外,他的科研成果是全球领先的,不仅是中国的骄傲,也是世界天文学的重要里程碑。这种在国际舞台上发生的科学成就,能让青少年更直观地感受到“科技强国”的现实意义,激发他们的民族自信与科技报国的志

向。这种鲜活性与时代感,是其他传统题材难以替代的。

□2019年推出《中国天眼:南仁东传》时,是否有将其推向教育领域的规划?书中哪些内容特质让你认为它“适合被下一代阅读”?

■在2019年推出这本书时,我们的初衷不仅是记录一位科学家的传奇人生,更是希望这本书能成为青少年了解科学家精神的窗口。当时我们就意识到,南仁东的故事和精神非常适合进入校园——他是近代科学家群像中少有的、与当代中国科技腾飞紧密契合的人物。书中大量描写了他艰苦的科研环境、严谨的科学态度、无私的奉献精神,这些对青少年的价值观塑造极具正面引导意义。更重要的是,书中有大量可视化、可感知的科学细节,比如,对贵州喀斯特地貌的考察、射电望远镜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在天穹下的情景,这不仅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,还能激发他们探索科学的兴趣。可以说,这本书天然具有进入教育领域的潜力。

□这次入选是否代表科普/科学家传记类作品将成为出版新重点?后续是否有类似选题储备?

■我认为,这次入选确实释放了积极信号——优质的科学家传记,特别是兼具文学性与科学精神的作品,完全可以在青少年阅读市场中占据重要位置。我们之前策划出版的《种子钟扬》也获得了年度“中国好书”。我们认为,未来科普类作品不应只是“知识搬运”,而要讲好“人”的故事,让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并行。我们已经在储备类似选题,包括当代中国在航天、人工智能、深海探索等领域的杰出科学家故事,也会关注一些年轻科学家的成长经历,以便更贴近中学生的视角。我们将探索“科普+文学”的融合路径,让这类作品既能在大众市场热销,又能进入学校教育体系,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力。

□教材发布后,是否收到来自行业、学校、家长或科学界等的特别反馈?

■教材发布后,我们收到了大量来自不同群体的反馈。教育界的朋友普遍认为,这篇课文为语文教材带来了科学题材的新鲜气息,既提升了科学素养教育的比重,又保留了文学性。家长们则在社交媒体上留言,说孩子读完后主动去查“中国天眼”的资料,有的甚至开始关注天文学知识。科学界的专家也给予高度肯定,认为这是科学精神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的一个重要契机。同时,出版界同行也与我们交流,希望借鉴这种“科学家故事+文学表达”的模式,探索更多面向青少年的优质内容。

□你希望这篇课文在10年后留给学生的集体记忆是什么?

■10年后,当这些学生已步入社会,我们希望他们还能记得课文里那个仰望星空、脚踏实地的科学家形象——南仁东。在他们的记忆中,南仁东不仅是建成“中国天眼”的科学家,更是一个用一生诠释“责任”“坚持”“无私”的人。我们希望这种记忆能在他们的人生关键时刻给予力量:面对困难时想到他的坚韧,做选择时想到他的担当,追求梦想时想到他那句“让全世界来支持我们”。如果未来某一天,他们在科研、工作或生活中,也能带着这样的精神去解决问题、服务社会,那么这篇课文的价值就真正延续到了下一个十年。

圆桌对话

由辽宁出版集团主办、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承办、辽宁省作家协会大力支持的“提升文化原创力——科幻创作与出版研讨会”,近期在沈阳举行。商报记者受邀主持当天活动的文学圆桌对话环节,向科幻作家、研究者、产业专家等提出科幻创作和研究,以及产业发展中的相关问题。

参与圆桌对话的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、科普时报社长尹传红,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联合发起人、时光幻象公司总经理董晶,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姜振宇,以及两位著名科幻作家宝树和程婧波。

记者:科普和科幻有一定差异,请介绍一下科普和科幻在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方面,有哪些异同?

尹传红:我认为科普是对已知的现实科学的描述和阐释,科幻是对未知的未来科学的想象和探索,这两者还是有比较明显区别的。

当然它们有共同点,都用科学色彩浓郁的笔触去传播科学,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。只不过科普更侧重于科学事实和理性思考,科幻的价值体现在它的想象力和前瞻思考。

我觉得在优秀的科普和科幻作品中,都有一些基本的特质。比如说他们对奇思妙想的科学解读,对新奇事物的形象描述,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引导,对于创新创造的理性思考都有比较好的呈现。

记者:具体到出版领域,科幻作品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?

尹传红:我们这一代人从少年时代,就受到优秀的中国科幻作品熏陶,对科学、对理工科产生兴趣,走进科学的世界。

我特别赞赏一位前辈的观点,他说科幻小说就是基础科学事实加上合理的想象。

记者:如何把历史、哲学与科学相结合,融合到科幻作品里?

宝树:我们创作的时候,一定是在科技和人文碰撞的地方产生最初的灵感。当科技和人的生活体验结合的时候,才能迸发出最多的火花。

另一方面,我们的历史、哲学、人文思想,也可以激发科幻作者的想象。它们发生了对话关系,发生了很复杂的互动。

像我之前也写过《成都往事》,里面有个“朱利”是怎么来的呢。大家知道古代蜀王杜宇的妻子是谁?这个比较冷僻,我们现在说他妻子叫“朱利”。这个名字特别像一个英文的女孩名字,然后我就想这个女孩子是穿越回来的,一下就和科幻结合起来。把科幻和四川的人文地理结合,就会发现真的有很多可写的。

记者:这些年我们国家和国际上的科幻文学交流很多。请讲讲中国科幻和世界的交流情况,中国科幻该如何更好地“走出去”?

宝树:这是挺大的一个话题,正好去年我到欧洲几个国家参加一些活动,印象还挺深的。其实现在在欧洲很多国家,西班牙、德国,他们对中国科幻相对都比较关注。我们讨论的作品,很多都会翻译出版到其他国家。像《三体》在很多书店都有,影响力确实非常大,带动中国科幻走向世界。

还有一点,中国科技的发展本身,实际上也更有影响力了。我曾在德国听一个汉学家的讲座,他说中国是未来的科幻国家。他在讲座中展示中国大城市的风貌、中国先进的高铁技术,引起阵阵惊叹。中国自身的发展,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关注。

记者:这些年能非常明显感受到女性作家和作品影响力在扩大,女性视角在科幻创作中会提供怎样不同的可能性和启发?

程婧波:作为一个创作者,今天听到两个词,我是特别感动和深有感触的。第一个词是柔性,这说明我们也注意到了科幻创作中有这样一种规律,并且尊重、允许多元的创作方式。第二个词就是多元。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,也是因为万卷出版公司在十多年时间里,一直在挖掘非常多元的中国科幻图书。

男性科幻作家和女性作家在创作上的区别是什么?我发现男作家的创作可以说是从宏大到微小,简单来说是从大到小,女作家的创作可以说是从微小到宏大,简单来说从小到大。

举一个例子,大家很熟悉刘慈欣的《乡村教师》,这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大到小的科幻创作。因为首先他讲的是宇宙级别的一个文明筛选,一个很高等的文明来到银河系,它要决定抹不抹掉地球文明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。但是它最后落到一个很小的地方,落到地球上一个偏远乡村的一个乡村教师身上。男作家的思维是非常系统性的。他们首先是被宏大的东西吸引,

当下科幻创作和研究向何处去

受访人:尹传红、宝树、程婧波、董晶、姜振宇
采访人:张中江(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)



然后在宏大里面去展现很多令人感动的闪光和分享的点。

我觉得女作家的创作其实是由微小到宏大,当然也不能说绝对。比如厄休拉·勒古恩创作的《黑暗的左手》,里面有一个非常小的点,书里面的人是雌雄同体的,这么小的一个点会诞生什么现象?在怀孕的时候,两口子可以选择是一号来生或者二号来生,就看谁变成女性这么一个小小的点。实际上作品的出发点是女性的日常经验,但最后写成一个特别宏大的故事,变成格森星球和地球之间的一个外交关系,变成宇宙文明之间的差异化观察。这是我阅读当中发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点。

记者:近年来科幻这么热,和影视有很大的关系。发掘一个科幻IP或者是转影视改编的话,会看重哪些因素?

董晶:我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场面比较好看的故事故,有精彩刺激的反转。常见的科幻电影,无非就是几大类:一种是场面大,比如像《星球大战》,打得非常激烈,视觉效果特别棒,看起来非常过瘾。一种是故事讲得特别好,能够引起关注共情的作品。

当然还有一种是悬疑烧脑,比如《盗梦空间》这一类,很多观众喜欢特别硬核的,“我能看懂那些别人看不出来的”这种。

这几类作品在好莱坞呈现是比较明显的,他们往往会从这几个领域出发。目前在中国来说,还主要是从场面宏大的角度选择更多一些。

比如我们都知道的《流浪地球》,实际上走的就是这样一个路线。本身在刘慈欣原著里是挺简单的故事,但经过导演郭帆的二次创作之后,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宇宙叙事。

记者:随着《流浪地球》电影、《三体》电视剧这些大制作影视,你觉得从文本到影视,目前还面临哪些方面的困难?

董晶:为什么现在只有一个《流浪地球》电影,一个《三体》电视剧比较成功。好莱坞全球票房前20名的影片几乎大部分都是科幻作品。每一部投资都很大,几十亿票房,说明它是能赚钱的。但几亿美元的投资,对中国的电影来说,还是极大的风险,不确定性非常强。有很多导演也好、制片人也好,雄心勃勃地把钱砸进去,最后血本无归的有很多。

可能过去中国的电影工业基础不是那么好,很多特效制作、服化道这些都要靠国外的成熟团队,意味着成本很高。现在在国内的环境来说,10亿票房算是不错的成绩。但科幻电影大制作动辄投资几个亿,10亿票房并不能保证盈利,这是目前最大的困难。《流浪地球》成功了,但还没有出现第二个这么成功的。

我觉得现在是国产电影突破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,我们不缺IP、不缺故事。好莱坞的科幻电影很老套,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,都可以达到甚至超越他们的水平。最大的困难是成本,AI的出现可能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契机。比如最近改编的《太阳坠落之时》,是中国首部用AIGC将咱们自己的科幻IP改编出来的科幻影视作品,极具代表性。

记者:请介绍下国内科幻文学研究方面的情况。姜振宇: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幻的时代。21世纪是一个在过去200年的科幻小说里被反复描绘、畅想的未来。我们正生活其中,该怎么来对这种“日常”做科幻研究?而且科幻和科幻之间的差别,有时候比科幻和非科幻之间的差别还要大。

科幻产业到今天有千亿的盘子,但和游戏产业还是没法比。各地现在都很重视,会有一些扶持政策,我们也会参与政策的咨询。现在文化、文旅有一个整体的大趋势,我们需要给科技赋予文化的意义,讲文化叙事,科幻恰好是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。

在今天月球探索计划甚至火星探索计划都已经被规划的时候,我们该如何来想象月球?这不仅是一个科技问题,也是一个文化问题。在科幻领域,有大量问题需要讨论,不仅仅需要作家的创作,也需要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努力。

资讯

《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》新书首发

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《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》新书首发暨座谈会,日前在辽宁省博物馆佩文斋盛大召开。此次活动由辽宁省博物馆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、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,汇聚了众多敦煌学界著名专家及文博界、图书馆界、高校代表。

《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》是国家“十四五”出版规划项目、2021—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、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,更是中宣部

牵头实施的“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”的重要阶段性成果,被列入“敦煌文献全集”。该项目自2023年3月启动,历经近两年的不懈努力,于2025年1月正式出版。

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向社会全面、完整刊布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献,是国内散藏敦煌文献整理和出版工作的重要代表,引发了社会各界对“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”的持续关注。(侯默)

《补书》新书首发 讲述修复师与古籍千年对话

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“古籍修复之美——从《补书》谈古籍保护与传承暨《补书》新书首发”活动,日前在浙江图书馆之江馆区启幕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、浙江图书馆、杭州国家版本馆的领导,古籍修复领域的权威,造纸厂代表、媒体人士及读者们共同见证了这一文化盛事。

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、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志清,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委员、浙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江,浙江图书馆副馆长谢贝妮、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

(古籍修复)传承人杜伟生,国家图书馆资深修复师、浙江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导师胡玉清共同为《补书》揭幕。这部由浙江图书馆资深古籍修复师汪帆倾心撰写的《补书》,凝结其近二十年指尖摩挲的修复心得,堪称一部修复师与千年古籍对话的生命史诗。

新书发布环节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旭斌主持。张志清、张建江、谢贝妮等参加活动并发言。“古籍修复之美”主题对谈由浙江图书馆古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童圣江主持,张志清、杜伟生、汪帆三位专家围坐论道。(侯默)